

果戈理

小说戏剧选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果戈理
小说戏剧选
满涛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小说戏剧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7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3}{8}$ 插页 3

1963年3月北京第1版

1979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9,001—59,000

书号 10019·1727 定价 1.20元

Н. В. ГОГОЛЬ
ПОВЕСТИ И КОМЕДИЯ «РЕВИЗОР»

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果戈理选集》选译。
作者像系据同一出版社 1949 年版《果戈理选集》第四卷复制。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
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
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
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作 者 像

譯 本 序

尼古拉·华西里耶維奇·果戈理于一八〇九年三月二十日（新历四月一日）誕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的大索罗庆采鎮。他的父亲是一个不很富有的中等地主，頗有文才，曾用俄文写过詩，还用乌克兰文写过几部喜剧。

果戈理在一八一九年进了波尔塔瓦的县立小学讀書，然后在一八二一年轉入涅仁中学。这时候，俄国剛经历了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人民的民族自觉心大大地提高了；紧接着，又掀起了貴族知識分子所领导的十二月党人运动。涅仁虽然較为偏僻，但是也不能不受到这一蓬勃的革命运动的影响。果戈理和許多同学一起爭讀十二月党人的刊物《北极星》，热情地背誦雷列耶夫和普希金的詩。他特別愛讀普希金的詩，把普希金当作崇拜的对象。

果戈理从学生时代起，就显露了卓越的艺术才能。他和同学们一起編輯手抄的刊物，有《文学彗星》等四五种之多。他把民間的警句、俗諺、歌謠以及历史文献等材料抄录在一本练习簿上，把它叫做“日用百科全书”。他写过詩、諷刺作品以及剧本《强盜》等。他又是戏剧活动的积极分子，从写剧本，画布景……直到演戏，什么事都要干。他在这些演出中主要是扮演老头子和老太婆一类的喜剧角色。他在馮維辛的《紈袴少年》里出色地扮演了普罗斯塔科娃太太。据当时目击的人回忆說：“沒有任何

一个演員曾經把普羅斯塔科娃的角色演得像十六岁的果戈理这样成功过。”

果戈理对陈腐的课程完全不感兴趣，但是对于教自然法的別洛烏索夫以及其他几位进步的老师却怀着极大的尊敬。这些老师经常介绍学生们阅读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著作。果戈理对別洛烏索夫大为倾倒，把他称做“稀有人物”。

一八二七年，新任校长奉派到涅仁中学来“整顿学风”。当时有人控告別洛烏索夫等人在学生中间宣传“自由思想”，这样，就制造出了所谓“別洛烏索夫案件”。这“案件”拖延了很久，牵累了许多人，果戈理也是被传讯的学生之一。校长把别人交出的果戈理的笔记本作为物证，要他证明別洛烏索夫在上课时宣传“政治方面犯罪的議論”。果戈理承认笔记本是他的，但是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上面抄的是一些法国启蒙学者的意见，这和別洛烏索夫没有关系，別洛烏索夫在上课时是按照规定的课本授课的”。但是，尽管別洛烏索夫等几位进步的教师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在果戈理离开学校一年以后，他们还是成了倾轧、陷害的牺牲者，被驱逐出学校。

果戈理在这时候已经严肃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目标的问题。他对周围腐败的环境感到十分憎恶，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里他把涅仁的人们称做“俗物”，这些俗物“用世俗和猥琐自满的外壳扑灭了人的崇高使命”，而他所感到痛苦的是必须在这些中间苟安偷生。在另外一封信里他又诉说自己沉痛、苦闷的心情，说他“好像是一个孤零零的人，漂泊在异乡”。

他决心要摆脱这种灰暗的奄奄无生气的生活，希望为祖国效劳。但是，他为祖国效劳的方法，他所设想的“人的崇高使命”，

是非常模糊的。他只想到在司法界服务，以为这样就可以造福人类，推动社会前进。

一八二八年夏天，果戈理从涅仁中学毕业。同年年底，一个初出茅庐的二十来岁的青年，就怀着对于未来生活的美丽幻想，出发到彼得堡去了。到了彼得堡以后不久，他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在现实的礁石上撞得粉碎。他带来的几封介绍信都没有能用上。他自费出版了一部题为《汉斯·古谢加顿》的叙事诗，但结果遭到严厉的批评，他从书店里收回全部存书，把它们焚毁了。他甚至也尝试过去投考演员，但是剧团的负责人是个伪古典派，要求演员必须装腔作势，果戈理的演剧才能当然不能被他所赏识。

一八二九年末，他终于谋到了一个小公务员的职位。官俸微薄得可怜，他经常过着受冻、挨饿的生活。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写道：“恐怕没有人在彼得堡生活得比我更俭朴了……，幸亏我已经有点习惯于寒冷，因此，能够穿着夏季薄外套挨过整整一冬。”

果戈理原来是为了追求理想才到彼得堡来的，哪知道在彼得堡接触到的，仍旧是同样卑污的现实。但是，如果说他的幼稚的幻想完全破灭，那么他梦寐以求的为祖国和人民谋福利的理想，却在现实环境中进一步受到了磨炼。在这一时期中，他一边在美术学院的夜校学习绘画，一边更加被文学所吸引，开始从事写作小说。一八三一年二月，他辞去了小公务员的职务，以后就完全把文学写作作为终生的事业了。就在这时候，他又认识和接近了大诗人普希金，这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起了巨大的影响。

从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二年，是果戈理写作活动最为旺盛的时期。他在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几乎写出了他的全部重要的

作品，計有：《狄康卡近乡夜話》（第一卷，1831年；第二卷，1832年）、《密尔格拉得》（1835年）、《彼得堡故事》（1835年）、《欽差大臣》（1836年）以及《死魂灵》的第一部（1835—1842年）等。

果戈理的作品以揭露封建农奴制度的腐朽、丑恶为内容，因而自然地引起封建农奴制度的热心的维护者的攻击。另一方面，进步輿論界支持他，贊揚他，也是很自然的。特别是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批評家別林斯基，首先发现了果戈理作品所包含的革新意义，写了无数篇富有战斗性的文章，保卫果戈理的傾向，闡述并發揚现实主义的文艺原則，摧枯拉朽地駁斥了反动文人們的种种邪論謬說。

果戈理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封建农奴制度及其必然崩潰的过程，是完全符合当时人民的斗争要求的，但是他的思想又非常复杂矛盾。他对旧社会深恶痛絕，但是，对于社会发展的前途却茫无所知，更不知道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变革社会制度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出路。他对自己作品中得出来的革命結論也感到害怕。他揭露了地主阶级和沙皇官吏的丑恶，但是他又把宗法制度的某些方面加以美化，主張倒退到已經消逝的古老宗法制度中去寻求出路。

果戈理思想上的这种矛盾，最初只是表露在他的某些作品当中（例如《肖像》、《羅馬》等），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俄国解放运动的繼續深化，消极的因素就更为加剧，先前作品中所表現的批判、揭露的力量就显著地削弱了。

他的一些斯拉夫派及其他保守、反动陣营的朋友，当他后期長時間居留国外时，就利用他思想上的弱点，拼命包围他，隔絕他和俄国国内进步思想界的联系，进行挑撥离間。这更促进了他思想上的消极因素的发展，引起了他的思想上的危机。

果戈理动手写作《死魂灵》的第二部，正是在他的思想危机开始逐渐发展的时期。他在第二部里描繪了一些地主階級寄生虫的形象如懶漢田退德尼科夫等，諷刺的力量还是非常巨大，大体上仍旧保持着第一部中的批判、揭露的傾向。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要在地主階級寄生虫的世界中寻找积极因素，把他們塑造成为理想人物，这些人物沒有现实根据，破坏了艺术的真实，因而招致了他的創作上无可挽回的失敗。

一八四七年一月，他出版了充滿伪善說教的《与友人书信选》。在这本书里，他公开宣傳斯拉夫派的反动主張，认为封建农奴制度是不可廢除的，认为只要在道德上进行自我教育就可以弥补社会制度的缺陷。这本书出版以后，立刻博得了反动文人們的喝采。他們高兴地看到，果戈理的靈魂“得救”了。他們包圍果戈理使他脫离革命影响的罪恶計劃終於收到了成效。連充当沙皇宪兵第三厅的特务、过去曾經大肆攻击果戈理的布尔加林，也假惺惺地引咎自責，說什麼以前对果戈理的“批評”未免失之“过苛”了。

但是，当时俄国进步的輿論界对这本书是一致予以憤怒的譴責的。別林斯基在一篇批評《与友人书信选》的文章里，指出果戈理落入反动文人們的陷阱，表示了万分的惋惜。一八四七年七月，別林斯基在德国查尔茨堡养病时，又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那封著名的《給果戈理的信》，这就是后来偉大革命导师列宁所說的“沒有遭受审查的民主主义出版物中最好的作品之一”。別林斯基在这封信里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沙皇俄国的病根所在。他认为，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就是廢除封建农奴制度，擺脫专制政体、正教、国粹主义，而不是像果戈理所說的那樣，要到神秘主义、禁欲主义里面去寻求出路。

果戈理的思想“危机”，充分反映了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作家在旧社会中找不到明确的出路，因而陷入的徬徨、苦悶的心情。他在长时期中对《死魂灵》的第二部进行过反复的修改，他焦思苦虑地企图表现客观的真实，但是因为摆脱不掉世界观中消极因素的影响，终于写不出他自己所满意的作品。一八四五年他曾经把原稿焚毁，重新从头写起。一八五二年一月，完成了第二稿，在病逝前十天又把它焚毁了。这个第二部现在幸存的只有最初的几章。

一八四八年春天，果戈理到耶路撒冷去作了一次身心交疲的宗教朝拜。同年五月，回到了俄国。此后，他的健康日益恶化，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新历三月四日）病逝于莫斯科。

果戈理在文学方面的成就非常卓越，他的小说和戏剧对于俄国文学的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别林斯基曾经说过，果戈理“在俄国创造了新的艺术，新的文学”；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说过：果戈理是“俄国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他认为“世界上久已没有这样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人民，像果戈理对于俄国这样重要”。

普希金和果戈理是俄国文学中的双璧。普希金在诗歌方面所完成任务，果戈理在散文方面把它完成了。普希金也写过许多篇小说，但他主要的成就是在诗歌方面。由于果戈理的创造性的劳动，小说才开始在俄国文学中取得了支配的地位。正像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创始人一样，果戈理可以说是俄罗斯的散文之父。

果戈理从最初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开始，就大胆地把普通人民写进作品里，这在当时俄国实在是破天荒的。出现在他的

作品里的人物，都是些教堂差役，农村的小伙子和大姑娘們。作品里充滿着純朴的語言，丰富的幽默，給人以清新的感觉。果戈理的作品，一开始就和主張鋪張堆砌、喜好陈腔烂調的貴族文学形成鮮明的对照。

《狄康卡近乡夜話》虽然也注意现实的描繪，但它更多偏重于浪漫主义的渲染。这以后，果戈理的观察、分析现实的力量更加成熟了；同时，他所接触到的现实也迫使他更加把注意力集中到生活的粗野平庸的方面来。他在后来的作品中，继承普希金的优良傳統，发展现实主义的創作方法，从而加强了文学中的批判傾向。他不仅如普希金說的：善于揭露“庸俗人的庸俗”，而更重要的是，剖开封建农奴制现实的表皮，毫无顾惜地揭露它的庸俗、空虛、丑恶，賦予“纏住人生的可怕的、惊人的瑣事的淤泥”以普遍意义，使人对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产生怀疑，从而充分發揮了文学的战斗作用。

沙皇鷹犬們一向痛恨果戈理作品的批判傾向，自从果戈理最早发表作品以来，就一直对之攻击不遺余力。布尔加林就曾經提出“自然派”这个称号，企图用来恶意地詆毀果戈理的作品。他认为，“自然派”主張毫不掩飾地描写现实生活，这就是貶低了文学的崇高的意义。他声势汹汹地責問說：“尽管写得多么巧妙，为什么要显示給我們看这些破烂，这些骯髒的檻樓呢？为什么要毫无目的地描繪人类生活后院的令人不愉快的图画呢？”別林斯基对这种把果戈理污蔑为“自然派”的說法給予了有力的駁斥。他认为果戈理是“现实生活的詩人”，果戈理作品的特点是把生活表現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他主張文学應該反映并批判现实，这种見解和布尔加林之流主張文

學應該粉飾現實的反動看法正好針鋒相對。反動文人拚命要掩護黑暗統治，所以認為果戈理描寫低微卑污的現實是罪大惡極，傷風敗俗，但是在別林斯基看來，反動文人認為大逆不道的地方卻正是說明了果戈理作品的劃時代的革新意義。結果，“自然派”的名稱仍舊保留了下來。然而，它不再是惡諷，反而變成了當時持有批判傾向的進步作家的旗幟，而果戈理則被公認為這一流派的創始者。

“自然派”，實質上就是後來所謂的批判現實主義，它和冷淡、旁觀的自然主義絕對是兩回事。果戈理的作品含有高貴的憤怒，他的愛憎態度在作品中表現得十分鮮明。他不抄襲自然，卻強調“必須有異常的靈魂深度，才能夠照亮取材於卑賤生活的圖景，把它提升為創造的珍珠”。這裡所說的“照亮”，所說的“提升”，正是說明果戈理不是一個態度冷淡的自然主義作家，恰恰相反，他要求文藝成為反對封建農奴制度的銳利的武器，用理想去“照亮”丑惡的現實，對丑惡的現實進行批判，使“生活的散文”提升為“生活的詩”。

果戈理的批判現實主義是以帶有无情的諷刺為特點的。他是俄羅斯文學中最傑出的諷刺作家之一。他善於發現日常生活中庸俗可笑之處，用來作為諷刺的對象。不過，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他的笑還只表現為幽默和滑稽，在當時，他常常嘲笑普通人身上的一些缺點，他認為這些缺點只不過是生活中次要的因素。隨著他深入觀察封建農奴制度下的現實，他逐漸感到丑惡現象在社會里占主導地位，開始以地主、貴族和官僚為描寫對象並採取批判態度，於是，他的笑就成為充滿嘲弄、鄙視和憤怒的諷刺。與此同時，對於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小人物，他的笑卻永遠是含着同情的，這就是所謂含淚的笑。

果戈理作品的特点还表现在他所创造的形象的真实性和典型力量中。他反对把抽象恶习加以拟人化，或者用主观色彩去塗染人物。正像別林斯基所說，他的作品“击败了俄国文学中两种錯誤的傾向：矯揉造作的、浮夸的、掄着硬紙做的宝劍的、像塗脂抹粉的演員一样的理想主义，諷刺的教誨主义”。他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批判总是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来达到的。他在許多篇作品中，創造出了无限丰富的人物群象，这些人物是整个阶层的表現，同时又是某一个具体的、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的作品批判和揭露的力量才格外深刻，强烈，他笔下的許多人物傳誦于广大讀者之口，他的人物的名字几乎每一个都变成了尽人皆知的普通名詞。

这本选集一共收了果戈理的四篇小說和一个剧本。我們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的創作中批判和揭露封建农奴制度以及他的现实主义手法等特点。

《塔拉斯·布尔巴》描写聚居在查波罗什的哥薩克起来反抗外族侵略者的故事。作品以起义农民作为主人公，直接描写到民族解放斗争，这在过去的俄国文学史中是絕无仅有的。

这是一篇历史題材的小說，但它不拘泥于严格的历史年代，也不是把史实作枯燥的罗列。它的目的是要写出生龙活虎般的查波罗什哥薩克們，写出他們对祖国的无限的忠誠和热爱。

塔拉斯·布尔巴尤其是这群人里面一个最为鮮明、突出的人物。他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对敌人說来，他是凶猛的复仇者；但是对伙伴說来，他是既严峻又慈祥的領袖。他的身上有那个严酷时代的烙印，他的豪迈、奔放、爽朗的性格完全是在战火的包圍中，被动乱的环境所造成的，是“灾难的火鏟从人民的胸

膛里敲击出来的”。

两个儿子刚从基輔的神学校毕业回到家，他就同他們揮拳动起武来，鼓励儿子要像打老子那样去打敌人；他不让儿子在家里多停留片刻，第二天立刻就从妻子身边把他們夺走，他說，他們需要的不是母亲的愛撫，而是廣闊自由的田野和凶悍的駿馬。

老布尔巴的粗獷性格中帶有些嫵媚，他的举止、行为是粗野的，但他的心灵又能承受細膩、深刻的感情。当伙伴被敌人俘虏的时候，他不忍丢开他們不管，一定要单独留下，率領一部分武装去搭救他們脫險。当安德烈投了敌人，虽然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却毫不犹豫地亲自把他打死。但是，当另一个忠于祖国的儿子奥斯达普在战斗中被擒时，他又悲伤得失声痛哭。他冒了不可設想的艱險、阻碍，一定要深入到敌后去重見奥斯达普一面。奥斯达普受刑时，显示出崇高、勇敢的气概，这使老布尔巴深深地感动了，他从人丛中喊出那一声震撼魂魄的“我听着呢！”来回答奥斯达普臨終时的呼吁。最后，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祖国举行了壮烈的血祭……作者通过这些細節，热情地歌頌以老布尔巴为代表的人民的爱国主义、自我牺牲等高貴的品质。

小說中出現的人物不下几十人之多。作者以酣暢淋漓的筆墨描繪了这群热情、豪爽、獅子般活跃，“向乌克兰全境泛濫出哥薩克的意态和气度”的人們。小說还用史詩式的筆法描繪了杜勃諾城下的战役；精雕細琢地刻画了敌人方面的天主教的文化 and 風俗等等。

这篇小說具有生动的描繪和抒情的气息，鮮明的历史特点和时代精神；作者善于把現實主义的描写和浪漫主义的筆調融合在一起，在人物身上寄托他的愛、希望和理想。作者在写給友人的一封信里說過：“借古喻今，你的言語就会增加三倍的力

量”，可見他不是隨便选取這個歷史題材，而是企圖通過歌頌英雄人物來抒寫他對現實中封建農奴制的憤懣和憎惡。

《涅瓦大街》在內容的精練、凝縮方面，可以說是短篇小說中的一篇代表作。

小說開頭對涅瓦大街的幾段描寫，實際上就是對整個沙皇俄國官僚社會的揭露。在這觸目盡是花領結、胳膊鬍子……熙熙攘攘的紳士淑女的大街上，一切都是虛偽的，可以收買的，連人類感情也變成市場上賣出買進的對象。

這是一個虛偽的、冷酷无情的社會，青年畫家庇斯卡辽夫的悲劇就在這裡展開。庇斯卡辽夫是一個真誠、坦率的人，他獻身於藝術，追求善和美，但是他的理想在唯利是圖、爾詐我虞的社會里是永遠無法實現的。他的追求只換得了痛苦的絕望，這個“安靜的、胆怯的、謙恭的、孩子般天真的人”，終於只能傷心絕望地死去。

與他相對照的是一個反动軍官庇羅果夫。他厚顏无耻，玩世不恭，把人生看作逢場作戲；在他看來，追逐金發女郎和娶有陪嫁的商人女兒做老婆這兩件事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和青年畫家庇斯卡辽夫的悲劇命運相反，這個庸俗透頂的庇羅果夫，在彼得堡的官僚社會里倒是一帆風順，過着非常美滿、幸福的日子。就這樣，作者以辛辣的筆鋒向摧殘美和理想的腐朽社會，表示了他的憤憤不平的心情。

《涅瓦大街》的篇幅並不長，作者能够在短小的篇幅里，通過兩個主人公在同一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寫出兩種人物的不同的命運，其藝術概括力之強，是值得注意的。

在描寫被侮辱的小人物方面，《外套》可以說是——篇典範之作。這篇小說刻畫了一個貧窮的小官吏巴施馬奇金的形象。這

是一个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人，他对生活没有什么奢望，甚至在机械的抄写工作中也得到乐趣。他整天伏案抄写公文，抄得背也驼了，眼睛也有点迷糊了。他挨饿，受冻，节省蜡烛……只想攒些钱，做一件新外套。作者让巴施马奇金忍受了种种折磨之后，还要使他受到外套被劫的打击，使他沉到绝望的深渊。最后，还要使他去求见那位声势煊赫的某要人，受到他的申斥而痛苦地死去。对于他，作者表示了深厚的同情。

另一方面，作者又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彼得堡官僚社会那种冷冰冰的窒息人的环境。办公室里的人侮辱他，把纸片撒在他头上……某要人声色俱厉地呵责他，当场就把他吓昏了过去……特别令人悲愤的是，他在这社会里竟像一只苍蝇一样，无声无臭地就从地面上消失了。人们直到他死后过了几天才知道他的死讯，大家对他的突然消失一点也不觉得惊奇，第二天，他的座位上已经换了另一个抄写员，仿佛世上从来就不曾有过他这个人一样。

这篇小说虽然没有写出正面抗争的形象，但是作者对腐朽社会制度毁灭人、扼杀人是表示了有力的抗议的。当时的俄国文学界崇尚华美文体，贵族气派，一般都不屑把贫穷的小人物写进小说里。继普希金的《驿站长》之后，果戈理在《外套》中以富有同情的笔调描写了默默忍受侮辱和压榨的小人物的悲剧，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它对以后俄国文学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许多作家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受过它那种同情弱小、反对强暴的人道主义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孕育出来的。”

《肖像》是一篇比较复杂的作品，在这里充分显露了作者世界观的矛盾性和双重性。